



今年不尋常的復活節

在當代政治與宗教交織的詭譎氣氛下，2026年復活節期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，儼然構成了一套「神棍政權」的反面教材。在4月1日白宮開始紀念復活節的時候，特朗普的屬靈導師葆拉·懷特（Paula White）牧師將特朗普面臨的挑戰比擬為耶穌基督的受難與復活，聲稱他正經歷與救主相似的重生，並最終將獲得勝利。當時在場的宗教領袖包括了葛培理牧師的兒子葛法蘭。這種將政治挑戰轉化為宗教受難的論述，成功地將追隨者的政治效忠轉化為一種宗教義務。之前，懷特牧師曾經說過，對特朗普說「不」就等同對神說「不」，換言之，特朗普就是神的代表。

這場風暴的高潮始於特朗普在理應象徵復和的復活節週日，於社群媒體上以粗鄙的言語對伊朗發出極端通牒，要求伊朗立即開放霍爾木茲海峽。兩天之後，特朗普更揚言若果伊朗不乖乖就範，那麼「整個文明將會滅亡，永不再回來」。

當外界質疑其言論是否符合基督徒體統和國際關係規矩時，其盟友達拉斯第一浸信會牧師羅伯特·傑弗里斯（Robert Jeffress）牧師提出辯護，他實質上為特朗普發放了「道德免死金牌」。傑弗里斯說：「如果特朗普總統是我們教會三年級主日學的老師，那或許是個問題，但他不是三年級主日學的老師。他是美國總統，總統有時會說些粗俗的話。我們歷任總統，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，都說過粗俗的話。」甘迺迪總統在古巴飛彈危機與列根總統在冷戰期間也說過強硬的話，但強硬不需要是粗鄙。傑弗里斯的辯護意味著，為了實現目標，特朗普被賦予了超越常人道德標準的特許權。

這場「造神運動」在特朗普與教宗利奧十四世（Pope Leo XIV）的隔空交火中達到巔峰。特朗普不僅狂傲地宣稱「若不是我在白宮，教宗便不可能在梵蒂岡」，更發布了一

張令人嘩然、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圖片，圖片中的特朗普身披聖袍，以醫治者的姿態出現在病榻前，其視覺語彙如聖光、神情與袍服，皆精確地複刻了基督教傳統中耶穌基督的救世主形象。儘管在輿論的一片謾罵與褻瀆指控下，他於十二小時後刪除了圖片，卻始終拒絕道歉，僅輕描淡寫地將其解釋為「醫生的形象」。然而，對於任何具備基督教文化常識的觀察者而言，這種視覺僭越不僅是權力的自我膨脹，更標誌著他試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永不犯錯、超越法治、具備神格特質的「救世主」，以此徹底合理化追隨者心中渴望權威與釋放本能的深層需求。隨後，基福臨牧師為特朗普辯解，說人們過度反應。特朗普後來發放了另一張人工生成的圖片，在圖片中耶穌基督站在他的身旁，暗示神是在他的那一邊。

解除焦慮、恢復舊有秩序的彌賽亞

在另一篇文章中，我分析過特朗普具有自戀型人格障礙（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, NPD），這種人格的極致就是自以為神的「彌賽亞情意結」（Messiah complex）

！這類人將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化為善與惡的對決，並且深信自己擁有特殊使命，是唯一能撥亂反正的英雄和救星。在威權政體中（例如蘇聯的史太林、納粹德國的希特拉、北韓的金氏家族、赤柬的波爾布特），「造神運動」是透過國家機器強制推行，例如一言堂式的洗腦、言論審查、監禁異議人士；但在民主國家，這往往透過民粹主義和飽和的媒體操縱來達成，再加上宗教領袖的背書，讓追隨者產生一種「他不是凡人」的錯覺。

英諺有云：「跳探戈舞需要兩個人（It takes two to dance a Tango）。」若果一個人口出狂言而沒有人理會，這並不會出現一場運動。「造神運動」需要臨界質量（Critical mass），那麼，為什麼那麼多人（包括許多應該有道德操守的宗教領袖）會義無反顧去跟隨一個狂人呢？恐懼管理理論（Terror Management Theory, TMT）或許可以用來解釋群眾為何追隨「強人」。當人類意識到自己的渺小、死亡的不可避免，或感受到生存威脅時（如經濟危機、文化入侵、戰爭焦慮），便會產生極大的焦慮。為了抵禦這種焦慮，人們會投向一個「比生命更偉大」（Larger-than-life）的象徵，追隨一個看似無所不能的「神」，能讓追隨者感受到自己也是這個強大實體的一部分，從而獲得安全感和永恆感。

社會認同理論（Social Identity Theory）是另一個解釋的框架，當一群人感到傳統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脅時（例如外來移民改變了白人社會文化，或者全球化導致本地產業空洞化和流失就業機會），他們便需要一個強大的領袖來代表他們，讓他們能夠恢復原本的身份認同和以往的美好生活，在這種氛圍下，「讓美國再次偉大」（Make America Great Again）變成為了一個扣人心弦的口號。追隨者會將自己渴望的力量投射到領袖身上，領袖展現出的「無所畏懼」和「挑戰建制」，被視為替追隨者報仇雪恨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領袖的缺點（如說謊、侮辱人）反而被解讀為「真性情」或「勇敢地顛覆建制」。一旦一個人在心

理上（甚至財務上）對某個領袖放上了巨大的投資，承認「我崇拜的人是個瘋子或騙子」會導致極大的痛苦。為了消除這種認知失調（Cognitive Dissonance）和不願意放棄已經付出的代價（Sunken cost），追隨者會自動過濾掉負面信息，甚至將領袖的荒謬行為解釋為「高深的戰略、下一盤大旗」或「左膠的迫害」。

最高領袖釋放了破壞的本能

但我以下所說的會令你更加不安，造神運動還有一個更加深層的原因：那就是人們所崇拜的救世主釋放了他們心底的破壞本能（死本能），合理化他們平時不敢做的事。例如礙於法律和社會規範，我們不會隨便毆打人、虐待人、殺人，但最高領袖指控地主、富農是無產階級的敵人、是反革命，人民對他們做什麼也可以。這種「空白支票」、「免死金牌」當然是極具吸引力的，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無法無天行為是「神」認可的，是不需要承擔任何後果的。

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特朗普連續口出狂言，但追隨者仍然死心塌地支持特朗普。說真的，在私底下其實很多人都會說粗俗、侮辱性的話，但礙於社會規範，在公眾場所我們會循規蹈矩。然而，他們的最高領袖說出了一般人平時不敢說的話，這是一種心理的解放。他們不單止是為最高領袖辯護，其實也是為自己辯護。追隨者透過觀察領袖的越界行為，獲得了一種替代性的快感。領袖成了他們的「替身」，替他們向那個讓他們感到束縛的建制吐口水。這不僅是釋放，更是一種權力感的補償。

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認為人類內心同時存在生本能（Eros）與死本能（Thanatos），有趣的是，死本能（Thanatos）這個字源自希臘的「死神」，漫威科幻片《復仇者聯盟》系列裏面的大奸角滅霸（Thanos）正是以死神命名。在電影中，滅霸並不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大奸大惡，他的追隨者當然也不是這樣看他，相反，滅霸認為自己消除了宇宙一半的生命是替天行道，自己就是重塑宇宙秩序的救世主！言歸正傳，在佛洛伊德的理論中，人類心底處藏着破壞的本能，隱藏着一個「滅霸」，然而，文明社會的法律和道德規範壓抑了這種破壞、侵略和死亡的本能。

當一個被神格化的領袖定義了「敵人」（無論是「人民公敵」、「深層政府」、「左膠」），他實際上是在告訴追隨者：「為了崇高的目標，你們可以暫時擺脫文明的枷鎖。」這種破壞行為本身會帶來一種原始的快感。當人們在政治運動中抄家、批鬥，或者在現代政治對立中進行網暴時，他們在心理上獲得了「合法施暴」的宣洩。而當個體融入群眾（Deindividuation）時，原本的道德防禦機制會崩潰。他們不再覺得自己是「張三」或「李四」，而是「領袖的戰士」，是「天國的精兵」。

為什麼民主社會和基督教無法制衡？

諷刺的是，特朗普支持者覺得他正在對付伊朗這個神棍政權，但現在特朗普政府亦已經變成了一個神棍政權。當然，兩者在性質和程度上還有巨大的差別，畢竟，美國仍然是具有制衡力的民主體制，仍然是在原則上政教分離的國家。無論如何，在輿論壓力下，特朗普已經把自己比擬為耶穌基督的圖像下架，不過，他自以為神的態度已經是昭然若揭。

基督教指出人人都有罪性，世界上沒有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！這種對人性悲觀的看法也是民主的基石，世界上沒有聖君明主，權力使人腐敗，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敗，因此領袖需要制衡。若果我們將任何人或者任何東西推上神壇，這就是上帝所厭惡的拜偶像、拜金牛！儘管聖經已經作出了最嚴厲的警告，但今天死心塌地支持特朗普的基督教領袖，依然堅持他所有言行都是對的，任何荒謬的東西總會有一個辯解的藉口。令人納悶的是，美國的民主制度和基督教精神本應是防範獨裁的盾牌，但為什麼現在仍然出現了造神運動呢？

心理學研究顯示，民主社會的資訊爆炸與社會撕裂，反而提供了造神運動的溫床。首先，高度發達的美國社會令人養尊處優，讀書和思考變成了奢侈的苛求；同一時間，資訊爆炸導致認知疲勞，人們不再願意分析政策，而傾向於選擇一個「簡單、強大、具備魅力」的人格符號，最好是永不犯錯的完美領袖，自己只需要「照單全收」。另一方面，基督教的基要派和福音派都具有濃厚的反智傳統，凡此種種都變成了「完美風暴」的條件。

2026年4月

〈美國的「造神運動」：特朗普的傲慢與褻瀆〉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原載於澳洲《同路人》雜誌

[更多資訊](#)